

第一章

修德振兵 三皇五帝俱为公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 夏朝的实际创始人 禹

一、修德振兵，三皇五帝俱为公

远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我们的祖先尚处在刀耕火种，半猿半人的原始阶段，在这漫漫的历史长夜中，我们称之为圣贤英雄的这类灵物，像东方之旭日，破晓而出了。圣贤出，河水清，圣贤出，文明兴。史圣司马迁为我们描绘了中华民族第一批圣人诞生后，我们的文明是怎样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并滋生、繁衍着我们伟大、勤劳的祖先的。

司马迁笔下第一个圣贤是黄帝。他记载说，黄帝是少典部族的子孙，姓公孙名叫轩辕。他“生而神圣，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但轩辕时代，神农氏的后代已经衰败了，各部落之间互相攻伐，残害百姓，先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轩辕氏立志拯救黎民，但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他面临的不仅仅是互相攻伐的各小部落诸侯，更有极端凶暴残忍、势力庞大而又桀骜不驯的蚩尤。此外，他还面临同样具有称霸诸侯之野心的炎帝的挑战。

为了完成拯救黎民的宏图报负，黄帝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他首先不是诉诸武力，而是“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同时，还训练了熊、貔、黑、貅、貔、虎等六种猛兽，从而建构了从道德、民心到武力的全方位、立体性的攻战体系。之后，他终于率兵出征。出征后，黄帝首先与欺压诸侯并企图争霸天下的炎帝进行大战，几经反复，终于战败了炎帝。接着，他携得胜之师，又与蚩尤在涿鹿郊野进行恶战，一举擒杀了蚩尤，成为天下归一的天子。

黄帝被尊为天子后，并未以为大功告成，万事大吉，他“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湖。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从而使天下平定，聊无战伐。

实现了天下平定，聊无战伐后的黄帝，可以说只是完成了他宏大战略的第一步，要治理好天下，统御好万民，黄帝又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他第二步、第三步战略规划了。他首先依靠频繁祭祀鬼神山川，获得了上天赐给的宝鼎，从而取得了坚摇不动的神圣地位，接着他观测太阳之运行规律，用占卜用的蓍草推算的办法，预知节气的日辰，使民众有了生存发展的基础。此外，他还任用风后、力牧、常先、大鸿等官吏协助他，推测阴阳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论述存亡的原因，并驯养鸟兽蚕虫，测定日月星辰以立历法，收取土石金玉以供民用，使天下大治，万民安居。这样，文明的国家基础、社会生活已萌芽于华夏大地了。

黄帝之后，颡顼、帝喾、帝尧、虞舜等帝相继统治先民

颡项是黄帝之后的又一位传说中的圣主。他“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契诚以祭礼”。终于发扬光大了黄帝的帝业，“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帝颡名为高辛，他是黄帝的曾孙，相传高辛生而有灵，一出生就能叫出自己的名字。高辛继帝位后，上顺天意，下解民急，仁德而威严，温和而守信。并“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以至达到“帝颡溉执中而遍天下，日用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的奇妙境界。

帝颡之后的圣者是帝尧。帝尧，就是放勋，司马迁称颂他“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天。富而不骄，贵而不舒。”

如果说黄帝的谋略更多的是表现在征伐战斗平定天下这方面的话，那么帝尧的谋略，智慧则更多的表现在治理天下，为万民以及子孙后代谋福祉方面。在远古时代，先民们面对的两大大任务，一是战胜自然灾害，组织发展生产活动，另一个就是平定天下，镇抚四方。

在第一个方面，帝尧表现出了卓绝的组织才能。他首先命令羲氏、和氏根据日月的出没，星辰的位次，制定了历法，并教给民众按节令从事生产的方法。据史料记载，帝尧时先民已能根据朱雀七宿初昏时的方位判断仲春之时，根据夏至日的白昼漫长，苍龙七宿中的心宿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来确定仲夏之时，根据秋分时黑夜与白昼一样长玄武七宿中的虚宿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来确定仲秋之时。最后，根据冬至日白昼最短，白虎七宿中的昴宿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来确定仲冬之时。在此基础上，帝尧还确定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并用置闰月的办法校正春夏秋冬四季，从而第一次使先民们有了完整的历法，可以

比较合理地安排春耕、夏作、秋收、冬藏等生产活动，安定了氏族社会先民们的生活。

接着，帝尧开始着手处理洪水滔天给先民们所造成的灾害。帝尧深知，靠自己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战胜洪水的，帝尧需要找到一个能代替他带领万民，身先士卒的贤人。

起先，帝尧听从了四岳的建议，任用了鲧，但鲧治水九年都没有成效。这一悲惨的结局使帝尧下决心寻找新的人选，以带领万民继续治理洪水。

帝尧选中的不是自己的儿子，他曾对推荐他儿子丹朱的人说，丹朱凶恶、顽愚，不能重用，又说，传位于丹朱，只是丹朱一人得利，但天下人都不得利，我毕竟不能使天下人受害而使丹朱一人得利。因此，帝尧决定寻找到一位天下共认的贤德之君来继承自己的天子之位。

帝尧选中的是一个单身流寓民间的平民虞舜。选中虞舜之后，帝尧用三年时间对他进行考察，他先是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从两个女儿身上考察他的德行，又让虞舜试任司徒之职，以观察他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的理解和处理。此外，尧还让虞舜参预百官之事，接待远方宾客，这些，虞舜处理得都很好。最后，尧又派虞舜进入山野丛林大川草泽，以考验他的勇敢和智慧。结果，虞舜在丛林大川草泽中战胜了暴风雨并做到了没有迷路误事。在以上考察结束后，尧在正月一日这一天正式把帝位禅让给了虞舜。

从帝尧禅位于虞舜这件事情上，我们发现帝尧的谋略也是十分宏远的。他首先毅然否决了选立自己儿子的建议，适应了氏族公社时代天下为公的传统礼法。同时又充分展示了他知人善任的品格和智谋。他听到四岳推荐虞舜后，不是立即把虞舜立为接班人，而是对虞舜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考验。在这三年岁月里，甚至还把虞舜放到山野丛林大泽中，把虞舜置于危机存

亡之地，终于成功地选出了接班人，既满足了先民们的需要，也实现了自己的宿愿。

虞舜继承天子之位后，他最成功的谋略是把氏族公社社会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整治出来，大大推进了国家形态的形成。

在政治制度方面表现在，虞舜修明了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规定诸侯用圭璧，三种彩增，卿大夫用羊、羔、大雁，士用死雉分别作为朝见的礼物，又规定诸侯要按时来京朝见天子，朝见时，由天子向他们陈述治国之道，并根据业绩明白对他进行考察，根据功劳给车马衣服。此外，虞舜还把天下分为十二个州以便于治理。

在法律制度方面，虞舜明确规定了可以用流放的方法宽减刺字、割鼻、断手、阉割、杀头五种刑罚，官府里治事用鞭子施刑，学府教育用戒尺惩罚，罚以黄金可用来赎罪，因灾害而造成过失的，予以赦免，怙恶不悛、坚持为害的则一定严惩。

比如在帝尧时没有来得及除去的浑沌、穷奇、檮杌、饕餮等四凶，掩蔽仁义、包庇残贼，行凶作恶，毁弃仁义，贪于财货、饮食，为害甚巨。舜就一举把他们放逐到边远的四裔，以御魑魅，从而使先民们可以放开四门，安心定居。

在知人善任方面，舜任用伯禹负责平治水土；任用弃负责农业，教化百姓，播种百谷；任用契施行五伦教育，以宽厚的态度和睦百官；任用皋陶严明法纪，使百姓信服；任用垂统帅工匠，负责公共工程；此外，舜还任命益主管山泽、伯夷主管祭祀，夔掌管音乐，教育贵州子弟，龙负责早晚传达天子的命令，报告下情。

任命完毕后，舜又制订了官吏的考核方法，规定对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功绩，经过三次考核，才能按照成绩决定升迁或贬黜。这套方法行之非常有效，史称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

“皋陶如大理，平民各优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和亲，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其中惟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并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瘦、氏、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使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二、变公为私，禹阳传贤私传子

虞舜六十一岁时接替尧登临天子之位。登位三十九年，逝世于巡视南方的途中，逝世之地相传为苍梧的郊野，埋葬地则在长江南岸的九嶷山。虞舜逝世后，禹登上了天子之位。

禹的大智大勇表现最突出的是在治水方面。禹治水是受命于父亲鲧治水无功被流放而亡的危难之际。禹接受任命之后，苦苦思索，并不辞劳苦，连续 13 年穿行在山川大岭之间，树立木桩，测定高山大川之状貌，以至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发现了疏导的方法，最终治平了洪水。

禹治平洪水之后，从此九州统一，四境平静，禹也因这一巨大的业绩而获得了天下诸侯和万民的拥戴，为继承虞舜的帝业奠定了基础。禹大智大勇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禹第一次打破了氏族公社制的传统，顺应了私有制产生的历史潮流，把天下大权实实在在放到了自己儿子的手上。

按照氏族公社制的古老传统，当时是人不独亲其子，天子之位也是要选贤任能的，在禹之前的尧、舜都不把帝位传予自己的儿子。但到了禹接任天子之位后，禹对接班人的态度就和

尧、舜不一样了。尧、舜是不仅在名义上把天子之位传于其选定的继承人，而且赋予其实权，让其充分展示才能，从而获得继承帝位所必须的威望与权能。但禹却不是这样做的，据史书记载，禹是表面上把帝位传予益，但实际上却不给益实权，益周围的官员也都是自己独生子的属吏。这样，当禹逝世后，益虽然也从禹那里继承了天子之位，但天下都不顺从他，诸侯们都纷纷离开益去朝拜启，说这是我们的君主禹帝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承了天子之位，成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开国之主，始称夏后帝启。

对于禹阳传益私传启的行为，后世史家并没有给予适当的评价，司马迁把启继承帝位的原因归结为益辅佐禹时间不长，试图轻描淡写地把这件重大历史事件翻过去，隐含为尊者讳的意思，但若细分析，我们仍然可以看出破绽，因为从禹把益定为继承人到禹逝世有 10 年之久，如果禹真心传位于益，是完全没有时间从容安排的。

不过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禹传位于自己的儿子不能视作一个阴谋，禹是适应了当时私有制已经产生的历史条件的，在历史上没有直接传位于启，而传位于益只是私有制还没有完成，当时社会还处于以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过渡时期，禹不便贸然把帝位直接传之于自己的儿子，他需要一个过渡。这体现了禹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和谋略。

禹第三个大谋略是从政治制度方面完成了从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国家形态的过渡。禹当政后很快下令，天子国都以外五百里以内的地区为甸服，即为天子服田役纳税务的地区，紧靠王城百里以内要交纳收割的整棵庄稼，一百里以外到二百里以内要交纳禾穗，二百里外到三百里以内要交纳谷粒，三百里以外到四百里以内要交纳粃米，四百里到五百里以内要交纳精米。甸服以外五百里的地称为侯服，即为天子侦察顺逆和服

侍王命的地区。靠近甸服一百里以内是卿大夫的采邑，往外二百里以内为小的封国，再往外二百里以内为诸侯的封地。侯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绥服，即受天子安抚，推行教化的地区，靠近侯服三百里以内视情况来推行礼乐制度、文章教化，往外二百里以内要振兴武威，保卫天子。绥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要服，即受天子的约束服从天子的政令，靠近绥服三百里以内要遵守教化，和平相处，往外二百里以内要遵守王法。要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荒服，即为天子守卫远边的荒远地区。

靠近要服三百里以内荒凉落后，那里的人来去不受限制，再往外二百里以内可以随意居住，不受约束。

这样，东临大海，西至沙漠，从北方到南方，禹的声威达到了四方荒远的边陲，奴隶制国家已呼之欲出，文明的光辉已在历史的天幕闪烁了。

第二章

汤武革命 吊民罚罪与民同利

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
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
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
姓，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
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

—— 宋朝大史学家 司马光

一、商汤革命，伊尹摄政

夏禹死，其子启继承其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夏王朝从启至桀共十六帝，十三代，四百七十二年（一说四百三十二年）夏王朝世袭制的创立，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进步。这个制度是由于私有制破坏了原始公社制而产生的，它的产生又反过来大大加速了私有制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但到夏最后一个君主桀，夏的政治腐败到了极点，本来，自夏第十一世君主孔甲以来，夏贵族骄奢淫逸，就引发了天下诸侯部落的背叛和反抗，夏统治者早应励精图志，敬天爱民以挽救王朝覆亡的厄运。可是夏的最后一任君主夏桀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肆欺压百姓，使百姓不能忍受。以至百姓指着太阳咒骂，你这个太阳啊，为什么不落下，我情愿与你一起灭亡。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阳谋大师诞生了。这就是开创了商四百九十六年（或六百二十九年）江山的商汤。

汤的先祖为契，契是夏禹时的贤臣，官居司徒，掌教化百姓，被封于商，到汤时，汤所在的部落已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的繁荣而日渐成为一个兴旺的小国。并且据史书记载，汤的十一代祖相土发明了马车，七代祖王亥发明了牛车，商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超过了夏，具备了取代夏朝的物质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商的君主汤确立了灭夏的大战略。汤首先设计从夏桀囚禁他的地方逃回，接着把都城从商丘迁到亳（山东青岛），以便于对夏发动突然攻击。

但对于商说，要发动对夏的最后攻击，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因为虽然夏桀已彻底失去百姓的支持，汤却还没有从道德、天命方面完全取而代之，汤必须补足这个功课。

据史书记载，汤的谋划是这样的，汤有一天外出游猎，看见郊野四面都张开网，并且听见张网的人祈祷说：从天下的四个方向都进入我的网中来吧。这个时候商汤就说：喂！这样就把鸟兽全部都打光了。于是就命令把罗网撤去三面。并说：想往左边走的就往左边走，想向右边逃的就向右边逃，不听从命令的，就进我的罗网吧。

这件事传出后，天下诸侯都知道了。他们纷纷赞叹说：汤

的道德真是达到极高的境界了，甚至连禽兽都受到了他的恩惠，还能虐待人民吗。于是，他们都对商汤心向往之。商汤渐渐的就获得了道德、天命的优势，赢得了天下诸侯的拥戴。

汤还任用伊尹为右相，仲虺为左相，以辅佐自己。伊尹、仲虺都是当时的大政治家、谋略家。尤其是伊尹，更是足智多谋，堪称中国贤相的祖师。史传当时，伊尹求见成汤，而苦无门路，于是就去给有莘氏做赔嫁的男仆，背着饭锅砧板来服侍成汤，借着谈论烹调滋味的机会向成汤进言，劝说他实行王道，以此为成汤任用。也有人说，伊尹本是个有才德而不肯做官的隐士，成汤曾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可见伊尹是不肯轻易事人，一定要得明主而事之的。伊尹归佐汤后，与汤议论素王及九主之事，得到了极大的信任，汤最后委任他管理国政，组成了坚强有力的统帅部。汤的国力更加强大了。

当这一切布置完善后，汤开始出兵伐夏桀，汤首先战败攻灭了夏在东方的三个同盟昆吾、韦（河南滑县）、顾（山东范县），获得了对夏桀的战略优势，接着又乘势攻击夏桀，与夏桀战于鸣条。在战斗前，汤为了鼓舞士气，同时，也为了取得道义上的神圣性，非常精心地准备了一篇誓言，这就是由史官记录下来的载在《尚书》中的《汤誓》一文，在该誓中，汤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穡事，而割夏正？’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这段话的意思是：“来吧，诸位都来听听我的讲话。不是我小子敢于犯上作乱，而是由于夏王犯下了许多罪行，上天命令我去诛杀他。现在你们众人或许会问：‘我们的君主根本就不关心体贴我们大家，因为他把我们的耕作收获这样的大事抛

到了一边，去讨伐夏王。这是为什么呢？’尽管我听到了你们的抱怨，但是由于夏王有罪，我害怕上天发怒，还是不敢不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大概又会问：‘夏王的罪行究竟有多大呀？’夏王一贯把沉重的劳役加在民众身上，耗尽了民力，对民众的剥削非常残酷。民众懈怠涣散，对他的怨恨都很大，纷纷诅咒他说：‘你这颗太阳什么时候才会坠落呀。我们宁愿跟你一起灭亡。’夏国的世道已经败坏到了这种地步，现在我非要去讨伐他不可。”说完这些话，汤又对部下申明了军纪，要求他们都要尽力辅助自己施行上天对夏王的惩罚，这样汤就会重重地奖赏他们，否则的话，汤就要把他们变成奴隶或者杀掉，对任何人都决不会宽赦。”汤的这些话果然大大地鼓舞了汤军的士气，结果夏桀一败涂地，不敢回洛阳，而是狼狈逃回昆吾，汤又果断追击，歼灭了昆吾，桀势穷而死。

汤则回到亳都，践天子位并宣布废除夏的政令，修改夏的历法，从而平定海内，自称武王。完全实现了商汤革命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私有制的完成。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靠革命和暴力的手段推翻旧的统治者并最终取得政权的君主，汤内心深处并不是没有压力的，毕竟革命和暴力是要流血的，是要引发激烈的社会变动的，汤虽然在其讨伐夏桀的誓言中表现了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意志，但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一旦取得胜利之后反倒心里出现了极度的不安。他觉得自己不是像尧舜那样以禅让的方式继承帝位，对自己的合法性仍不敢十分自信。因此，他对自己的另一位大臣仲虺说：“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意思是说我很担心后世会把我当作谈论的话柄。对此，仲虺从汤的仁德和夏桀的暴虐两方面向汤说明其行动的正义性，获得了汤的认可，但是，最让汤感到满意的还不是以上的话而是接下来的议论。仲虺说：“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意思是辅佐贤能的人，协助仁德的人；兼并弱小的部落，讨伐昏庸的诸侯，夺取动乱的政权，轻慢亡国的君主。应该灭亡的，就促使他灭亡；应该生存的，就帮助他巩固，这样，国家才会昌盛。德行日日更新，万国都会归附；心志骄傲自满，亲戚也会疏离。这段议论可谓为汤的革命找到了理论的依据，它告诉汤，汤的革命是正义的，是无须为此而惭愧的。汤果然由此消除了心中的疑虑，重新开始了建设新国家的工作。从他留给后人的一篇称作《汤诰》的训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汤显然已经恢复或重建了自己的自信。他不仅重申了自己革命的正义性，而且还以无比的自信向他的人民表示：天命无误，因为惩罚夏桀之后，天下像繁茂的草木一样光辉灿烂，亿万人民也因此而重获生机。虽然这时汤还不知道自己是否得罪了天地神灵的话，但是，这时，与其说汤是为讨伐夏桀而担心天地神灵，还不如说汤是在为了自己国家未来的命运而祈祷上苍。因此，汤在这篇著名的训词最后，把一切可能的灾难和罪责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他惟一的期望是：以他的诚挚和忠信能够换回他的国家和人民的美好结局。

商汤死后，伊尹继续辅佐其子孙，到商第四任国君太甲继位后，伊尹为教育太甲作了《伊训》、《肆命》、《徂后》三篇文章，《伊训》是伊尹的训词，《肆命》意思是陈政教所当为也，《徂后》，则是言商汤之法度。但帝甲继位三年后，暴虐不明，不遵商汤制定的法度，使国家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都大为败坏。于是伊尹毅然流放太甲于桐宫，自己摄政当国，召见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从善，于是，伊尹又迎之而还政于太甲。太甲这次重回帝位后果然修德宁民，使天下诸侯宾服。于是伊尹作太甲训三篇，极力赞美太甲，并称之为太宗，

太宗死，其子沃丁即位，伊尹继续为相，直至百岁而卒，死时相传大雾三天，沃丁以天子礼葬之。

伊尹放逐太甲，待其悔过后又迎回这一壮举，非大智大勇不能为。而且，伊尹开创的这一先例，也为后世贤相放逐无道暴君提供了一个可以师法的范本，伊尹也藉此得以跻身于中国最早的阳谋大师行列。

二、武王伐纣，周公分封

商朝末年，也和夏朝末年一样，出现了一个暴虐的君主，这就是殷纣王。相传殷纣王“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并能“手格猛兽”，但殷纣王对于这些天赋却不能善加利用，而是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自己是天下最高明的人，进而好酒淫乐，为长夜之饮。

殷纣王的倒行逆使终于弄得天怨人怒，诸侯纷纷背叛他而投向了殷商西部边疆的小国——西周，投向了西周的头领西伯（史称文王）。

那么，西伯凭什么有如此号召力，引得天下诸侯心向往之，纷纷投奔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从西伯行仁政开始说起。

孟子认为，西伯所行仁政，实际上就是一种新兴的土地制度，按照这种制度，西伯把田地划分为公田、私田。私田分给农民，公田则由分得私田的农民耕种，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私田则是八家各分百亩。大小官都有分地，子孙继承，作为公禄。商贾往来，西伯也不收税，水泽里捕鱼也不禁止，在政治法律方面，西伯实行了一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的

政策，对百姓的压迫大大减轻。

这样，西伯治下的百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就空前高涨，如诗经《大雅·灵台》篇说文王筑高台，庶民们像替父亲做事那样雀跃，很快高台就筑成了，殷纣王治下的殷民甚至也带着妻儿想跳出国境，投奔西伯。

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殷纣王，西伯针对殷纣王招诱奴隶，为其他诸侯怨恨的情况，定出了一条“有亡荒阅”的政策，意思是说对逃亡的奴隶要进行大搜索，不许私自藏匿，要归还其主人。

西伯实行“有亡荒阅”政策后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殷纣王，争取了天下诸侯的拥护。西伯的势力日益扩大，史称西到密（甘肃灵谷县）东北到黎（山西黎城县），东到邪（河南沁阳县附近），都成了西伯的地盘。这样，西伯的势力就形成了对殷纣都城朝歌的进逼之势。

接着，西伯又把势力扩充到长江、汉水、汝水三个流域，并把那里的蛮夷教育感化了过来，成为自己的盟国。到西伯晚年，他已取得天下三分有其二的地盘，创造了灭商的基本条件。

但西伯到死并未能寻找到灭亡殷纣王的良机。这一使命遂历史性地落在了其子武王发身上。其子武王发也是一代圣主，他即位三个月后，就召见师尚父向他询问黄帝、高阳等先古明君的治国之道，并认识到只有实行仁政才能国运长久，以暴力统治只能亡国。为此，他回到起居处后，就把从师尚父那里听到的治国之道和感想制成戒语，刻在自己起居的各个角落，甚至在鞋子、酒具、门、窗、剑、弓、矛上都刻写诫语，以便时时处处提醒自己。

在席的前左端刻的是“安乐必敬”（居于安乐，行为必须恭敬，不可傲慢待人），在席子的前右端刻的是“无行可悔”

（事情做过是不能后悔的），席的后左端刻的是“一反一侧，安不可忘”（对于先王的教诲，即使在睡觉翻身时，也不能忘记），在席的后右端刻的是“所监不远，视迩所化”（作为借鉴的事离你并不远，要时常看看自己近来的作为），镜子上刻的是“见尔前，虑尔后”（凡事既要看到你眼前能够看到的，也要考虑你身后看不到的）。洗浴的盘上刻的是：“与其溺于人，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溺于人不可救也”（与落入别人设置的圈套比比，宁可落入深深的水潭中。落在水潭中还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游水自救；而倘若落入别人的圈套，那就只有任人割了）。在柱子上刻的是“毋曰有残，其福将然；毋曰胡伤，其祸将长”（不可随意残害别人，那样的话，会很快召致祸事，也不可随便出口伤人，那样会招致别人的怨恨，埋下给自己造成灾难的长久隐患）。刻在杖上的是：“恶乎危于忿，恶乎失道于嗜欲，恶乎相忘于富贵”（最令人厌恶的行为是由于愤怒而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由于纵情于享乐而失去道德，由于富贵而忘掉了朋友）。衣带上的警语是：“慎成必戒，则寿”（待人做事一定要谨慎小心、恭恭敬敬，为人恭敬有礼，心态平和，就能长寿）。剑上刻的是：“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剑带在身上，是把它看作是服饰的一部分的。如果你要动用它，那就必须是行德，是代表正义去惩罚邪恶。为此而用剑你的事业当然会愈加兴盛。如果违背原则而动用武力，那你的事业将崩溃）。矛上刻的是“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矛啊矛，是对立两方的象征。为人处事，如果与人稍有矛盾就不能容忍，那弄不好就会造成终生的屈辱）。

这些警名格言，自刻写以后，武王时时鞭策自己，使自己的道德修养，运筹水平大大地提升了一步。同时，这也有力地感召着他的臣民和百姓，甚至天下诸侯，周的国力更加强大了。

于是，公元前一〇六六年，即西伯死去后四年，武王觉得时机成熟，开始兴兵伐纣了。相传，在武王伐纣前，武王先派遣间谍，到殷商国都以刺探国情，回来的人说，坏人执政当权，国政混乱极了。武王认为时机未到。未久，又回来人报告，殷纣王朝里好人全被放逐，武王还是认为时机未到，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有回来的人报告说，殷纣王的百姓都闭口不说话了，武王才认为条件成熟。

但第一次东征伐纣，武王仅率军达于盟津，当时，虽然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并且都说：“纣可伐矣”，武王仍坚持“尔未知天命”仍旧回归本国。

直到纣剖比干、囚箕子，殷纣的大师、少师各持其祭乐器投奔而来时，周武王才决定出兵伐纣，与纣进行最后的决战。

这年，也就是盟津大会诸侯的第三年，武王遵循其父西伯（文王）的遗志，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浩浩荡荡，向殷都朝歌进发。这年十二月戊午，大军渡过盟津，在这决战的前夜，周武王进行了最后的战前动员以鼓舞士气。

他首先历数了殷纣王的暴行，他说：“如今殷纣王竟听信妇人之言，以致自绝于天，毁坏天、地、人的正道，疏远他的亲族兄弟，又抛弃了他祖先传下的乐曲，甚至谱淫荡之声，扰乱雅正的音乐，去讨女人的欢心”，接着发出战斗的呼吁，要大军“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二月，甲子早晨，武王率大军进抵殷商都朝歌郊外的牧野。在这里，武王再次进行战前动员，武王说：“远矣西土之人”，“嗟！我有国家君、司徒、司马、司空、西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彭、濮人等，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矛其誓”“古人有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惟妇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